



9月18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前往联合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正式递交加入联合国的申请,要求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联合国会员国身份。这份申请得到了上百个国家的支持。

迟到的巴勒斯坦国终于要来了。

迟到的巴勒斯坦国

■文/本刊综合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历史纠纷

历史上,犹太人(古称希伯来人)、迦南人、阿拉伯人等一起曾共同生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只是犹太人遭遇了三次大流散,阿拉伯人才逐渐成为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居民。19世纪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初步兴起。犹太资产阶级也乘机打出“犹太民族主义”的旗帜,从而把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一般愿望发展成为系统的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和有组织的政治运动。据统计,1917年4月,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超过5万,1939年猛增到44.5万多人,已占巴勒斯坦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

1947年11月29日,“联大”通过

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规定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于1948年8月结束,其后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阿拉伯面积11000多平方公里,包括北部的加利利、约旦河以西地区和加沙地区;犹太国面积14000多平方公里;耶路撒冷市成为一个在国际政权下的独立主体,由联合国管理。

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联大”分治决议的通过是个大好的时机,决定采用武力建立犹太国。

1948年5月14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成立以色列国。15日,阿拉伯联盟国家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战争正式开始。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巴勒斯坦战争的结果是:“阿拉伯国”领土完全丧失,要么被以色列或约旦兼并,要么处于埃及的军事统治;巴勒斯坦地区的大部分阿拉伯人沦为难民,尽管一些巴勒斯坦上层人士终于意识到了“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的必要,不断呼吁联合国出面支持,但“西方国家的政府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权,出于不同的目的却怀着同样不明言的希望,即巴勒斯坦问题应该消失”。在一段时间里,“难民问题”成了“巴勒斯坦问题”的代名词。

没有希望的“阿拉伯解决”

为了争取自身权益,失去了家园而又不愿归附于约旦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开始了对新的斗争方式的探索。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处于流散状态的巴勒斯坦人大致分为三个阵营:一个是拥戴约旦王室的纳沙希比等家族势力及其跟随者,他们或已成为约旦公民,或是愿意看到原“阿拉伯国”领土全部纳入约旦的版图。为此,他们在一般意义上也为巴勒斯坦人的权益而呼吁和斗争。

另一个是反哈希姆王朝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这一运动的目标是“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团结,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阿拉伯领土”,“为1948年战争的耻辱复仇”,因此对巴勒斯坦人有很强的吸引力。

游离于这两个阵营之外的,是受“巴勒斯坦地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处于初始阶段的激进青年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主张依靠独立的和直接的反以武装斗争实现解放巴勒斯坦的目标,对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所谓阿拉伯社会主义不感兴趣,但渴望得到纳赛尔和其它阿拉伯势力的支持。

约旦王室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严厉禁止巴勒斯坦人的反以活动。当时一股反以力量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有一个明显的意图,即在加沙政治

中占据主导地位，其目的包含了同埃及王室的抗衡。他们同穆斯林兄弟会加沙分支机构成员和新一代有独立倾向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的合作受到了加沙埃及军事统治机构和穆斯林兄弟会开罗总部的限制。在1952年7月埃及革命的鼓舞下，穆斯林兄弟会在加沙的活动有所发展，11个分支组织的成员扩大到千人左右。但1954年11月“穆斯林兄弟会”被纳赛尔宣布为非法后，这些组织及其巴勒斯坦盟友遭到严厉镇压。

50年代后期，美苏两大阵营在中东地区的对峙局面逐渐形成。在冷战规则的牵制下，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阿拉伯各国不可能为了巴勒斯坦人的权益铤而走险，尽管“解放阿拉伯被占领土”的口号一直被喊得震天响。巴勒斯坦人逐渐认识到了“阿拉伯解决”是靠不住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对阿拉伯国家是否有能力帮助他们收复失去的家园已感到失望”。

以“法塔赫”为代表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崛起

对“阿拉伯解决”的失望必然导致巴勒斯坦人自发地组织起来。早在50年代初期，不同背景的巴勒斯坦青年知识分子就开始分头酝酿成立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抵抗组织。1957年8月，前开罗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在科威特组织起了一个秘密的5人小组，并于1959年初以出版和在阿拉伯各国散发《我们的巴勒斯坦》月刊的形式拉开了独立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的序幕，这个名为“法塔赫”的组织成为日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流派别。

在汲取了以往教训的基础上，创始阶段的“法塔赫”便制定了两项原则：一是必须组织和武装自己，二是不得加入任何阿拉伯政党和运动，包括穆斯林兄弟会。需要指出的是：新一代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没有利用伊斯兰宗教势力壮大自己，在相当长的

时间里排除了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干扰。

由于巴解组织本身并不是巴勒斯坦人自主创建的，“法塔赫”非但没有得到帮助，反而被受到埃及严密控制的“巴勒斯坦解放军”拉走了80%的军事干部。1965—1967年间，只有仍处于秘密状态的“法塔赫”以“暴风”突击队的名义实际开展了武装斗争。

阿拉伯国家的防备使得“法塔赫”的武装斗争变得异常艰难，始终维持在小规模袭扰的水平。自1965年1月1日“打响第一枪”，至1967年“六五战争”爆发的两年半时间里，“法塔

赫”的同时，也带来了两方面的负面效应：一是在“法塔赫”迅猛壮大的之际，“左翼”的“人阵”势力也随之崛起，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开始陷入严重分裂；二是以约旦为基地而开展的武装斗争不仅使约旦成为以色列报复的目标，激化了巴勒斯坦抵抗势力同约旦王室的矛盾和冲突，而巴勒斯坦人的激进行为和主张又使这一冲突变得不可调，最终导致巴解组织被赶出约旦。

1968年12月，“人阵”把战场转移到欧洲，在雅典机场袭击以色列客机，招致以色列空军炸毁了贝鲁特机场上的13架阿拉伯民航飞机。1970



赫”发动的袭击只造成以色列方面14人死亡，72人受伤。

尽管如此，“法塔赫”的举动仍博得了阿拉伯世界的尊敬。“阿拉伯世界的领袖”纳赛尔在1967年11月首次会见了阿拉法特，自称“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也于12月在大马士革宣告成立。

1969年2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开罗举行第5次代表大会，105个委员席位中的57个被分配给各游击队组织，33位“法塔赫”成员当上了委员，阿拉法特当选为巴解执委会主席。

从武装斗争到政治解决 武装斗争在促进巴勒斯坦解放事

年7月，“人阵”在安曼举行了大规模反对“叛徒”纳赛尔的示威，不仅激怒了埃及政府，也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普遍反感。约旦军队于1971年7月13日向巴解武装发动了残酷的清剿，数千名巴解游击队员被杀或被俘，另有200人渡过约旦河向以色列投降。7月19日，巴解终止了在约旦的存在，被全部赶往黎巴嫩和叙利亚。

撤离约旦之后，巴解在黎巴嫩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生存。尽管黎巴嫩特殊的国情为巴解的生存和活动提供了一定便利，但在黎巴嫩政府的限制和以色列的严密防守之下，巴解组织很难开展一般意义上的游击战争。

巴勒斯坦势力在黎巴嫩的膨胀不仅成为黎巴嫩连年内战的主要起因，

还招致以色列多次对黎巴嫩的入侵。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内战中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日渐壮大。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前,巴解武装力量已经发展到2.5万人,甚至拥有足以同以色列打一场正规战的6,000人野战部队、300辆坦克、300辆装甲运输车和1,000多门各类火炮,无论是兵力还是武器装备水平都大大超过了黎巴嫩政府军。因此,不难理解以色列为什么要发动黎巴嫩战争,将巴解彻底赶出黎巴嫩。

巴解在黎巴嫩建立的第二个“国中之国”随着1982年黎巴嫩战争的结束而丧失。至此,巴解组织完全失去了同以色列的战场接触,开展武装斗争的基本条件已不复存在。

另一个因素是1973年战争之后,阿以冲突由军事对抗阶段转入政治解决阶段。所有阿拉伯前线国家都不愿意再次同以色列发生战争,也不可能为支持巴解组织的武装斗争而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巴解组织在其武装力量不断恢复和壮大的同时,逐渐认识到了政治解决的必然性。大环境的改变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最终促使巴解组织放弃了武装斗争。

奥斯陆协议框架内的建国历程

同样基于政治解决的需要,联合国大会于1974年11月邀请阿拉法特在第29届联大辩论巴勒斯坦问题时发言。正是在这届大会上,联大通过了巴勒斯坦人民有“取得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的第3236号决议,以及邀请巴解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大会议和工作的第3237号决议,确立了巴解组织在国际社会的合法代表性。1980年7月29日,第35届联大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这一权利。

形势的发展促使以色列和约旦加紧了预备性安排谈判。1987年4月11日,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在伦敦达成秘密协议,决定在安理会第242和338号决议的基础上组成双

边委员会讨论巴勒斯坦前途。

在联合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共同压力之下,约旦国王侯赛因于1988年7月30日签署法令,解散了由约旦河两岸各30名议员组成的议会下院,并于次日宣布“割断同西岸的法律行政关系”。这为1988年11月宣布成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铺平了道路。

巴勒斯坦“宣布建国”一个月之后,阿拉法特同美国犹太人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会晤,表示接受美国提出的放弃恐怖主义和承认以色列的前提条件,愿意同美国政府的代表进行对话。

1993年9月13日,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在白宫草坪正式签署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原则宣言》(“奥斯陆协议”)。“奥斯陆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巴解组织选择了通过谈判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根据“奥斯陆协议”的安排,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永久(最终)地位的谈判将不迟于1996年5月开始,永久地位的协议将在1999年5月开始生效。也就是说,到了1999年5月,双方将达成巴勒斯坦是否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协议。

由于双方极端势力的阻挠和以色列政局的多次变化,巴以和平进程一再受挫。“奥斯陆协议”规定的期限已经被突破,在新的期限2000年9月13日临近的时候,巴以双方就永久地位举行的“戴维营谈判”再告破裂,“阿克萨起义”随之爆发,“奥斯陆协议”制定的时间表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

毫无疑问,根据通行的国际法准则,巴勒斯坦人已经初步具备了建立国家的基本条件。

但是,“奥斯陆协定”的签订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民选择了“谈判建国”的道路,而单方面宣布建国是对“谈判建国”方针的否定,会被认为是单方面推出和平进程的毁约行为,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利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根本利益。毕竟,巴勒斯坦人还可以通过谈判得到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权益,

在收回土地的过程没有结束的时候,在没有划定最终边界的时候,在没有实际控制耶路撒冷的任何一部分土地的时候,绝不能说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的时机已经成熟。

巴勒斯坦有望成为观察员国

按照加入联合国的程序,巴勒斯坦要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相关提案首先要在安理会获得通过,然后才能向联大提出建议,此后还要获得联大三分之二的会员国同意。但美国已明确表示将行使否决权,目前看来,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希望不大。

这次巴勒斯坦做好了准备,一旦寻求联合国会员国的努力失败,将寻求身份的升级,即由原先的观察员身份升至非会员国身份。法新社预测,在联合国大会范围内,巴勒斯坦可轻松获得更多支持,身份升级应当没有悬念。因为巴勒斯坦很有可能取得联大2/3多数国家的支持,将巴勒斯坦从目前的无投票权“政治实体”观察员地位,提升至无投票权“国家”观察员地位。

这种地位提升会为巴勒斯坦最终以合法国家身份进入联合国打下坚实基础,这也是以色列所担心的。因为巴成为观察员国后,就有资格加入联合国的许多机构和公约,这将对以色列构成外交冲击。美国也无法掌握足够的支持,来阻止联大这项表决。

总的来看,巴勒斯坦建国是历史的必然。但就目前而言,即使实现建国目标,也是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巴勒斯坦建国将标志着阿拉伯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但在目前,巴勒斯坦建国仍面临众多问题,首先就是领土没确定,还有经济不独立,巴勒斯坦的经济依附于以色列,依靠以色列征税返还。再者巴勒斯坦没有独立军队,无法保障国家安全。现在中东局势正处在动荡之中,面临很多不确定的问题,叙利亚局势动荡,如果爆发战争势必波及巴勒斯坦,为巴勒斯坦建国增加更多现实的困难。//